

17 至 19 世纪山西官方的天主教政策

王 守 恩

提 要：1620~1723 年是天主教在山西合法传入的阶段，山西官方在此阶段对天主教的政策是允许传播，甚或支持利用。1724~1859 年间，山西官方将天主教视作邪教加以严禁，但该教禁而不绝，终于在山西扎根立足。1860~1900 年间，山西官方对天主教虽然被迫弛禁，但仍极力压抑；这一阶段天主教有外国强力支持，山西社会的诸多问题又为其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该教在山西传播日益广泛、初步发展起来。

王守恩，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17 至 19 世纪 山西官方 天主教

山西是天主教传入较早的内陆省份之一。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山西天主教已有 280 年（1620~1900）的历史。在此期间，天主教在山西经历了传入、立足和初步发展三个阶段。本文拟对这三个阶段山西官方的天主教政策做一较为全面的考察，以补学界对此课题研究的不足^①。

—

1620~1723 年是天主教在晋传播的第一个阶段，即合法传入阶段。山西官方在此阶段对天主教的政策是允许传播，甚或支持利用。

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以介绍、宣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适应、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传教的途径和手段。一批中国官绅受到新知、新学的吸引，或看中了天主教与儒教的某些相同、相似之处，所以赞同天主教；礼部尚书徐光启等朝廷高官还入了教。当时的几位皇帝都采取允许该教在华传播的政策。在山西，许多地方官对传教士态度友善，有些还与其来往密切。天主教传入山西不仅为官方所允许，而且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最早入教的山西人是绛州的韩氏兄弟及其家属。举人韩云、韩霖兄弟都曾师从徐光启，并都与传教士相交。据山西教会人士所言，17 世纪

初叶，韩霖在北京入教^②。1620 年，韩氏邀请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到绛州开教，为其家属授洗，天主教从此传入山西。1624 年，绛州建成山西第一座天主堂^③。

1625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到绛州传教。此后明宗室灵丘王朱士塋全家入教，将王府宫邸献作教堂。1633 年任绛州知州的雷翀亦受洗入教^④。他还于 1635 年发布告示，号召民众信奉天主教。其告示曰：“开辟一天，万古所尊，正道唯一而已。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相传所谓事天帝、事上帝者是也。先儒解曰：上帝天之主宰。……即至愚之人，不识不知，未尝不曰天爷、曰天命、曰天理、曰听天、曰靠天、曰天报，可见性中带来，原非勉强。自二教〔佛道〕惑乱人心，使人不尊天而尊己，所以从古大儒极力辟之。更可恨者，非佛非道，有无为、金蝉等教名，欺天悖理，煽惑愚民，甚至结党为非，大干王章法纪。幸有西儒高先生修身事天，爱人如己，以教忠教孝为第一事。上自圣天子、贤宰相莫不敬礼之，以至缙绅、学校诸君子尊之如师傅，爱之如兄弟。百姓从其教者，皆化为良民。其有功朝廷、裨益世道大矣。尔乡民有心向善，何不归于正道，乃甘从邪教，欲为善而反得恶耶？夫圣天子固天纵之聪明，而贤宰相以下皆孔

圣之弟子也，岂识见不如尔乡民耶？尔等又何疑焉、而不弃邪归正哉？为此出示。明智之人，自能迁改。即见理未明、一时未能从教者，犹可由愚抵智、由顽化良。若不但执迷、敢从白莲、无为等教者，定行访拿。其胁从之人，一并治罪不贷。”^⑤

由此可知，雷朔将高一志视为西儒，将其教与儒教认同，而对不尊天的佛、道、白莲、无为诸教均予排斥；他要“尊天祛邪”，援引利用天主教来配合儒教，对付邪教，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受到北京朝廷的影响，二是面临陕北农民起义对晋南的威胁。

由于官方的支持利用，天主教在绛州教务大兴。高一志到达绛州的当年就收教徒 200 余人（内有举贡生员 80 余人），次年复授洗 500 人。到 1630 年，绛州教徒已有 2000 余人^⑥；1664 年，更增至 3300 人^⑦。绛州可以说是当时天主教在中国最活跃、最成功的传教区之一。

蒲州的情况与绛州相似。1631 年，由大学士致仕归里的韩爌邀请高一志到蒲州开教，授洗 150 名书生，1637 年又授洗 1600 人^⑧。

除绛州、蒲州外，明末山西的若干地方也已传入天主教。例如太原，1631 年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弥格到绛州后，旋奉高一志之命到太原开教，授洗 200 人，在城内建起教堂。到 1640 年高一志逝世时，山西已有大小教堂 50 处，教徒 8000 余人^⑨。

此后，由于王朝更迭及教务无人主持，山西教徒的数量减少。1696 年罗马教廷设立山西代牧教区，1702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张安当任山西代牧主教。1705 年张氏死于太原，当时全省约有 3000 名教徒，分属太原、绛州两个堂口^⑩。教徒人数虽然减少，但传入州县却在增加。据新修各市、县志及《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等的记载，到 1724 年，除前述三地外，天主教至少已经传入阳曲、徐沟、文水、忻州、汾阳、祁县、介休、屯留、长治、潞城、壶关、临汾、洪洞等处。

二

1704、1715 年，罗马教皇针对中国教务两

次发谕，禁止天主堂内悬挂“敬天”之匾，教徒不许行祭孔、祭祖之礼，不得在家中设置写有“灵位、神主”等字的牌位^⑪。礼仪之争导致聚焦于中西宗教相异之处而排拒西教的意见渐占上风。1720 年，康熙帝在教王禁约译文上批曰：“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⑫这一硃批定下了全面禁教的政策。雍正帝继位后，从 1724 年起在全国实施严禁，到 1844 年才在五个商埠弛禁；内地之禁则持续到 1860 年之前。在此期间，山西官方将天主教视作邪教，积极执行严禁政策，并且查拿尤为尽力。

1724 年，绛州知州万国宣将在当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何天章遣送澳门，把绛州天主堂改建为东雍书院^⑬。

1746 年 8 月 12 日，内阁奉上谕，令各省查拿天主教，由此引发了一次全国性的查禁行动。而在此上谕发出之前约一个月，山西霍州地方官已于赵城县一乡民家拿获西洋传教士王若含。9 月 8 日，山西巡抚阿里衮奏报了此事，并言“西洋左道煽惑乡愚，久奉严禁。臣亦不时告诫属员，令其申严禁绝”^⑭。可以说，当时山西地方官的禁教是积极、主动的，山西与福建一起走在了这次各省查禁行动之前。

1784 年 12 月 13 日，山西浑源知州黄照禀报查获李培元等相沿习教之五人^⑮。同时，陕西渭南查获传教士，供出山西、山东、湖广、直隶各省俱有西洋及内地人传教。乾隆帝旋于 12 月 22 日令各省一体严密查拿。乾隆年间的第二次全国性查禁行动随即开始。

在这次行动中，山西查处了许多人员。据晋抚农起 1785 年 3 月 31 日奏报：西洋传教士安多呢、华人神甫徐盖达诺和窝留安多呢的范天保解京审讯，分别发遣，财产查抄入官。会首李时泰等 6 人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容各神甫潜住往来或辗转传教的李有亮等 8 人杖一百，徒三年，折责发落。相沿传习之韩连等 65 人各杖一百，勒令悔改，释放安业，令地方官严加监管^⑯。

1805 年 5、6 月间，山西人李如接引西洋人从澳门到家乡阳曲传教，途中在广东被捕。李如

供出其妻及祖、父等 5 人信教，由刑部移知晋抚拿办^⑦。

1816~1819 年间，山西掀起又一次禁教热潮。1816 年 10 月，晋抚衡龄奏报：屯留县访获 7 名、凤台县、汾阳县各访获 5 名习教人犯。李成喜等 6 人坚不出教，拟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俱面刺外遣二字。孔传芳等 11 人改悔出教，各杖一百，徒三年^⑧。

1817 年 2 月 21 日衡龄接奉上谕“凡向来习教之家，如真心悔悟……免其治罪”，当即出示晓谕。该年先后有阳曲县 211 人、太原县 101 人、忻州 14 人、榆次 13 人、祁县 12 人、文水 10 人、汾阳 3 人、绛州 39 人自首出教，具结改悔。各人保释后，按名造册存记档案，并于门牌注明改悔字样，由乡地随时稽察^⑨。

同年 10~11 月，平遥县侯奇太等 6 人、祁县康宁忠等 23 人被访拿到案，并不出教。其中 26 人发往回城。祁县有 2 人年逾 70、1 人双目失明，故在当地永远枷号，并将犯事案由标明晓示，以昭炯戒^⑩。

1819 年，平遥拿获习教县民 16 人。伍安命等 11 人不愿出教，其中 9 人发往回城为奴；1 人年逾 60，改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1 人年逾 70，在当地永远枷号。高有玉等 5 人改悔出教，其中 1 人在保释治病后脱逃，4 人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责 40 板。该年又有 142 人先后自首出教，得免治罪^⑪。

1836 年，道光帝令各省严查天主教。1838 年，岳阳县拿获顺天府教案中人犯孔广原，解交刑部归案申办。同年，该县还有赵金义等 19 人、洪洞有李成信等 11 人、灵石有沙彦庭等 14 人、霍州有房振丰等 7 人、赵城有李忠顺等 5 人被获，分别受到惩处、发落^⑫。

在官方严禁、不时访拿的同时，山西在 1716 年之后的 128 年中与陕西合并为山陕教区，教务由陕西主教兼管。尽管如此，山西天主教不绝如缕，仍在传播。1724 至 1859 年是该教在晋传播的第二个阶段，即立足阶段。从地方志和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天主教又传入霍县、浑源、交城、榆次、太谷、平遥、灵石、赵城、曲沃、岳阳、襄垣、高平、阳城、凤台、大

同等州县以及口外的归绥、宁远两厅。1844 年，山陕教区分开，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杜嘉弼任山西主教，当时全省教徒已恢复到七八千人^⑬。该教终于在山西立足、扎下根来。

为什么天主教在山西禁而不绝？其原因有：外国传教士转入秘密活动，并对不许祭祖的禁约做了一定变通。经过 1724 年前 1 个多世纪的传播，山西已经形成一些教徒村，外国传教士隐藏其中，外人难以知晓内情。而且，不少村庄的传教者是中国神甫，甚至是曾经外出打工、经商者及从别处迁来定居者，根本没有外国传教士。有些村庄连中国传教者也没有，教徒世代相传，口授念经，并无经卷、图像、十字架等物。这些村庄不会引人注目，官方也难以访闻查实。更重要的是，天主教在山西有其存在、立足的社会根源，文末对此将予略述。

三

1860 年后，天主教由不平等条约和北京朝廷恢复了合法地位。但是，山西官方的看法并无实质变化，它仍被视为异端、邪教。例如：1861 年的凤台知县称之为“法国邪教”^⑭。1864 年的绛州知州称之为“异教”^⑮。1882 年的大同知县称之为“洋鬼子反叛教”、山西学政称之为“鬼子教”^⑯。因此，天主教在山西事实上并未完全获得合法地位；官方对它的政策在 1860~1900 年间是被迫弛禁、尽力压抑。这一政策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第一，设法阻止外国传教士定居传教，驱逐中国传教者。

1861 年，有一传教士行经山西某地偶停歇店，“该处地方官竟将店主大加呵斥，谓其容留匪类”^⑰。同年 7 月，法国传教士梁多明要求归还雍正年间改为东雍书院的原绛州天主教堂。山西官方推三阻四，延宕两年多，才在总理衙门的压力下于 1863 年 11 月将该书院一切房地交清结案^⑱。1873 年，外国传教士在归化买地建堂。“该处同知拘拿业主弟兄四人囚禁在狱，并将说事中人皆传押在署，仍追契纸入官”，明言“不准容留洋人……建堂及另造房屋”^⑲。这种作法得到了朝廷认可。1882 年 7 月 2 日，有人奏陈

“限止传教之法在于禁止民人擅卖房产给教士”，硃批曰“此即通融办法矣，是在良吏勉为之耳”^③。直到 1895 年，教方在内地置产才“毋庸先报地方官。”^④

在千方百计阻止外国传教士定居传教的同时，山西地方官还对非土著的中国传教者予以驱逐。例如：1861 年，潞城县人王天宝在凤台县阎庄村传教。凤台知县阮葵先是暗谕乡约呈控其租赁房屋、聚众诵经等事；继以“鸣钟传教，男女混杂，村众惊骇，又唆令教徒傅士元强租屋舍、殴打妇女，被人指控在案”为由，传该村社首“谕著房主将天主教所赁之房速即腾出，驱逐出境”^⑤。1874 年，在孝义县尹家园等村传教的陕西吴堡县人武安朝被控指使、包庇教徒偷窃而遭驱逐。教方禀称此案为被诬控、屈打成招。晋抚鲍源深令人核查后称，县令堂讯时，武安朝语多不逊，故将其笞掌责各五十。武安朝终被递解原籍交保管束^⑥。1881 年，直隶传教士王先塏等在山西天镇县定安营村传教，村民高应珍与之发生纠纷，教方要求查办。结果是：“查王先塏等籍隶直省西宁县，高应珍居住山西天镇。虽属邻村，究系隔省……断令该教民等以后毋庸再赴该村讲道。”^⑦

第二，直接下令禁止民众入教，并利用科举阻止士人入教、逼迫其退教。

传教条约签订后，依据约定，清廷应将其遍为张贴，但“山西各属多有未贴者”^⑧。1861 年，“凤台县所属之天井关地方有奉教之人，该知县查禁”。捕役“剿毁所供天主圣像及赞诵天主字轴……又将奉教二人押班”^⑨。1874 年，孝义县令以引入邪教、扰乱地方秩序等罪名将几个新入教者鞭打、监禁^⑩。1882 年，省城发售大清律例，其内还有禁止天主教的各个条例^⑪。直到 1884 年山西州县仍有示禁：“民人不准入白莲、上帝诸教”^⑫。1886 年，赵城县圣王村有教徒 12 家，知县“将该教民所供之神像经卷拿去，不准习教”^⑬。

对于士人，山西官方还以不准应考和革去功名的手段阻其入教、迫其退教。80 年代初的学政告诫省学的教授和学生，如果接受了西教信仰，将被取消功名地位^⑭。1882 年，王学政阻止

襄垣县教童李浚明应考。1883 年，潞安府何知府阻止所属壶关县教徒郭恩保、郭根保应考，并不准廩保保教徒。同年，文水县学生员任承惠因系教徒，被吕学台斥革^⑮。1885 年，总理衙门奏准“不应因士子习教而不准应试”^⑯。但次年李浚明于县考时仍被教官把持试卷、不得应考；文水县教童任殿卿于院考时亦被高学台怒骂扣卷、未能参试^⑰。1887 年，山西主教禀称：高学政“仍不准教民考试；无论何处下马，即查有天主教生童否，若查出有习西教者即不准考，并严飭各教官囑廩保不保教童……本年汾州府平遥县文童任国兴被该县教官令伊具背教之结，该童不从。该教官与廩保说，此系学台之公令，非此不得应试，遂拦阻之。本年大同府、朔平府、朔州等处已被学政高严查习教生童，飭令背教，方准应考”。据当时法使函称，山西“叠次不准教民考试，并不准各学廩保出保教童入考……不但京中向无此例，而各省亦未曾有之”^⑱。直到 1889 年，新任学政还在沿袭前任做法，出示令奉教童生出具安分不敢妄为切实甘结（实为背教甘结）；文水县一名教童已有廩保互保，依旧不准应试^⑲。

第三，在民教纠纷中压抑教徒，纵民扰教。

山西村社皆有其庙。集资建筑维修神庙是村社的重要职能。逢庙神诞辰、重大节日及春祈秋报、禳灾庆丰，特别是求雨和谢雨，村社都要举行祭神仪式，为之献演乐舞百戏，此即迎神赛会。它在山西十分盛行，所需费用系向村民摊派而来。1861 年，法国公使应山西教会之请照会清廷，要求上述费用永免教徒摊钱^⑳。清廷被迫答应，此后教徒即不出此钱，时人称其为“不随社”。这导致村社首领权力的部分失落及民教之间的一大矛盾。许多村社组织呈控或自行惩罚入教者，在灌溉、看青等公益事务中打击制裁教徒，并以多种方式向其强索传统宗教费用（例如抢掠什物、盗毁田禾、砍伐果树、捆吊庙中、殴打罚钱等），力图迫其沿守旧规。山西绝大多数教案主要由此产生。

面对日益增多的民教纠纷，多数山西地方官是袒民抑教，有的还纵民扰教。1871 至 1876 年的晋抚鲍源深尽量不见教士，他自言其意曰，

“深之不轻予教士接见者，所以裁教士，即所以抑教民”^⑧。其抑教倾向是不加遮掩的。鲍源深抚晋前后，许多山西地方官的态度和做法与他如出一辙。

1862 年 4 月教方禀称，岳阳县出示云“凡尔社内遇有公事，均遵照向规摊派，毋得轻信该教民之言扰乱向规”。同时凤台县教徒诉称：官令阎庄村社首常瞎猫逼勒教徒入社受罚。常率百余人将李祥泰揪拖入庙，勒令罚钱 100 千文修庙唱戏。县断量其家资不称，减等罚钱 40 千文。又将常枝海手足攒捆抬入庙中，勒罚焚香摆供，外加罚钱 10 千文。常等还将李祥泰弟兄桑、柿、柏树抢伐 40 余株，并伐傅小炳树 10 余株，且诬控小炳打人。县官即出差役，勒索 5 千文，堂讯又重笞 150 余下^⑨。

1873 年秋收时，孝义县东头村教徒郭起茂的成熟田禾被乡地郭士郎使人盗去几乎一半。郭起茂于 11 月 22 日呈诉到县，县令在其呈上批曰，“尔如不入天主教，何致……禾稼被人盗取。自招其祸，反行控人违法欺良”。案件一直未予审理。后来郭士郎等控郭起茂买耕牛一头隐税不报，新县令才于 1874 年 1 月 22 日将双方传讯，断令郭起茂补税，其被盗田禾则须等捉到正贼究追给补^⑩。

1881 年，大同县榆林村教徒杨天资等屡被社首管芳等人逼索戏钱，管祥之妻还被打堕胎，其后教徒赴县呈控。5 月 11 日堂讯，知县问杨天资你何国人？杨答小的是清国人。知县训斥说：你既是清国人，为什么要随洋鬼子反叛教？你们尽是反叛！村中问你们要戏钱，你们不出。因此打你们，你们还敢告状！你们一定该出戏钱。若不出戏钱，不准你们在清国住，出外国去！骂过以后，喝令下堂具结。8 月 9 日，社首们又向杨天资要戏钱，损坏家门，将杨掷入一水坑内。8 月 20 日，将纪二莜麦割去七八分，25 日复将纪三两亩菜地刨拔。教徒们诉到大同府。9 月 4 日过堂，知府说打了你要伤，刨园要凭。教徒回答有凭。知府说不算，既然殴打堕胎，为何当下不报不验？若要包赔田禾，一村何住？结果虽然免了教徒摊出戏钱，但管芳等人纠众打人、割取田禾、伤坏菜果等概未追究，当堂逼令

教徒具结完案。管芳等人次日即又割去管祥豆禾二分有零^⑪。

在民教戏资纠纷中，多数山西地方官最终迫不得已而判教徒胜诉，但这决非袒教抑民。他们采取了变通的抑教之法，即一面纵民抗教，一面“于别项公款所派比常民较多，此等情形山西为尤甚”。“山西各处教民仍须出迎神演戏等费，否则别项公用必致比常民加倍，是仍与出演戏等费无异”^⑫。

1881 至 1884 年的晋抚张之洞于 1882 年设立教案局，“遇有教案，令教堂函致该局，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其来臣处径读者，斥之不答。飭令各州县遇案必秉公剖断，其逞刁之教民，飭其〔教会〕驱逐出教；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教堂之安分讲理者，亦即施以嘉奖”。表面看来，如此施政确属公平。但是何谓逞刁生事？何谓安分讲理？非教徒认为教徒不随社、教士支持教徒向官府呈诉就是逞刁生事。教方则认为不随社已得朝廷批准，是合法的，因此涉讼亦属安分讲理。是非曲直没有各方公认的标准，官方又如何“秉公剖断”？张之洞的主旨实为“仰恳敕下总理衙门，遇有晋省教案，捏词朦耸，该国公使向总署搅扰者，一切据理驳斥，切嘱该公使不可偏听受欺。臣于外间斟酌操纵，断不容其〔教会〕长成气焰，亦不至滋生事端”^⑬。其抑教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倾向在 80、90 年代仍是山西官方天主教政策的主导方面。直到 1898 年，传教士还在抱怨凤台县一带教民迭次受到扰累^⑭。

1860 至 1900 年是天主教在晋传播的第三个阶段，即初步发展阶段。尽管山西官方采取抑教政策，该教还是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

杜嘉弼于 1862 年辞职回国。1870 至 1890 年的山西主教为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江类思。因其年老多病，教务实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副主教艾士杰主持。1890 年，罗马教廷将山西教区划分为南北两境。南境教区包括长治等 54 个州县，归荷兰方济各会士管理。北境教区包括太原等 51 个州县，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管辖。此后 10 年，天主教在山西发展很快、教徒数量大增。

据笔者统计，这一阶段天主教新传入的州县

有石楼、孝义、宁乡、临县、永宁、长子、临晋、蒲县、隰州、和顺、怀仁、陵川、沁州、沁水、榆社、武乡、平定、翼城、襄陵、太平、乡宁、阳高、天镇、左云、朔州、五台、神池、崞县、浮山、黎城等州县及口外的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丰镇、清水河等厅。到 1900 年，天主教共传入山西的 61 个州县及口外 7 厅（当时隶属山西）。当时的教徒数量，北境教区为 1.7 万余人，南境教区为 1.8 万余人^⑤，口外 7 厅为 22470 余人，56 全省已有 57470 余人。

事实表明，山西官方的抑教政策虽然不无成效（如果无此压抑，天主教势力在一些地方可能发展得更快、更大），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未能遏止天主教在山西的初步传播。其原因来自内外两个方面。这一阶段教会有外国强力支持，朝廷以退让保和局，山西官方不能为所欲为，一些抑教措施难以贯彻到底。更重要的是，清代以来特别是近代山西传统社会内部的诸多问题为天主教的立足、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当时山西生态环境开始恶化，小农经济萎靡不振，灾荒瘟疫频繁发生，毒品危害日益蔓延；广大民众贫穷困苦、无知无助；政府官吏腐败无能、扰民虐民；阶级矛盾和人地矛盾交相加剧，社会保障救助功能严重短缺。这一切造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都需要特殊关怀的社会群体。而天主教正好提供了这种关怀，所以它能在官方严禁之下扎根立足、并能在官方弛禁后虽受压抑但仍在山西初步发展起来。

（责任编辑：东 月）

①黄一农的《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6 期），探讨了天主教如何能在绛州开教、并吸引许多地方官绅和民众的认同，以及该教在地方上引发何种程度的冲突与对立。该文考察的地域是绛州，时间集中于雍正禁教以前及咸丰弛禁初期。赵英霞的《明末清初山西天主教之际遇》（载于行龙主编《多学科视野中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27～340

页），探讨了从明末传入到清代被禁期间山西天主教的历史境遇，即 1840 年前天主教在山西传播的概况。以上两文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笔者在此谨向其作者致谢。

②⑤郭继汾：《天主教在山西之创始及其发展》，《山西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31；32、33 页。

③④⑧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 46 卷，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367、532；384；367 页。

⑤⑥⑨⑩②③郭崇禧：《山西天主教简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 5 卷，第 850；849；849～850；850；850～851 页。

⑦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6 期。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 册，第 48～49；49；97、98 页；第 2 册，第 524、525；689、690；877～879、883～885 页；第 3 册，第 1085～1087；1093～1101；1097～1099、1117、1118；1127～1130；1227～1237 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 1974～1981 年刊行，第 1 辑，第 726；714 页；第 4 辑，第 320、330 页；第 1 辑，第 723～757 页；第 3 辑，第 464 页；第 5 辑，第 655 页；第 1 辑，第 714～716 页；第 3 辑，第 482～497 页；第 4 辑，第 313、325 页；第 1 辑，第 714、715 页；第 4 辑，第 323；334；330、331；331 页；第 5 辑，第 627、628；637 页；第 3 辑，第 493 页；第 1 辑，第 716、717 页；第 3 辑，第 476、477、480 页；第 4 辑，第 312～316、318～321；328 页；第 6 辑，第 689 页。

⑮光绪《直隶绛州志》，第 6 卷下，第 28 页；第 17 卷，第 59～60 页。

⑰⑱⑲⑳㉑㉒照会，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8；78；79；77、78 页。

⑳㉑㉒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 册，第 361、362；406；421 页；第 3 册，第 605 页。

㉗《天主教修会通讯》，里昂，1875 年，第 99 页。

㉘〔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4 页。